

肯尼亚族群身份 建构及其政治化

李 佳

内容提要 族群在很多非洲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肯尼亚是族群身份最深入人心的国家之一。与很多非洲国家相同，族群身份在肯尼亚的产生与殖民统治息息相关。然而，族群身份的建构不仅是殖民历史所造成的，也是肯尼亚人对变化的政治环境产生反应的结果。独立早期肯尼亚政治精英对族群身份的操纵和利用，造成了排他性族群认同的强化以及族群身份的政治化。民主化之后，族群身份的政治化不仅体现在政党联盟建设层面，还体现在普通民众层面，族群身份是影响投票决定的最重要因素。2010 年宪法改革重塑了肯尼亚政治权力结构，促使政党结成更广泛的多族群联盟，在未来选举中仅依据族群身份将难以预测选举结果。然而，新宪法并没有彻底改变族群身份政治化在肯尼亚政治中的显著影响。如何建构一个多族群一体化的国家仍然是肯尼亚在未来政治改革进程中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关键词 肯尼亚 族群身份 族群政治 建构主义 政党政治

作者简介 李佳，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84）。

引 言

关于非洲政治的学术研究和新闻报道经常强调族群身份（ethnic identity）的重要作用。本文所说的族群，指的是由共同的语言、宗教、种族、习俗、历史和地域等一种或多种因素构成的文化复合体，是一种需要自我认同和他人定义的群体。本文所说的族群身份，指的是基于上述族群而产生的身份意识。族群因素常

被认为是非洲国家经济欠发达的原因之一，族群因素也影响了精英联盟建设、投票行为、公共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等很多理论的基础。

肯尼亚是族群身份最深入人心的非洲国家之一。尽管一些观察者认为独立后的肯尼亚很有可能产生族群对立的局面，在乔莫·肯雅塔总统（Jomo Kenyatta）的领导下，肯尼亚在独立初期经济增长，政治稳定。然而，自 20 世纪 90 年代民主化以来，肯尼亚族群冲突频发，其中 2007 年大选期间的族群冲突不仅造成了上千人死亡和上万人流离失所，还深刻地影响着肯尼亚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这种强烈反差不由得引人深思。然而，族群冲突并不是一簇而就的，其背后往往隐藏着深层次的历史和政治原因。族群身份本身并不会引起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分裂，只有当族群身份被政治精英所利用或操纵以达到政治目的时，以族群身份为基础的政治动员、资源分配等才会造成排他性族群身份的强化，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族群身份的政治化，简称为“族群政治”。

族群政治主要包含三个层面：其一，在政党层面，族群政治体现为政党成员主要由特定族群构成，其成立基本上是为了维护和促进特定族群的利益，并以此来对抗“敌对”族群的利益。其二，在政治精英层面，族群政治体现在政治精英们沿着族群的裂痕进行政治动员。其三，在普通民众层面，族群政治则体现在人们对于本族群政党或个人的政治支持。^① 无论着眼于族群政治的哪个层面，族群政治与政党和选举都息息相关。本文以肯尼亚为例，在梳理其殖民时期和独立后政治进程的基础上，解释肯尼亚族群身份产生与强化的过程，分析族群政治在政党、政治精英以及普通民众层面的具体表现。

族群身份形成的相关理论

在比较政治学领域，族群正成为一个日渐重要的解释变量。关于族群身份的讨论往往同族群冲突的起源紧密相连，人们常使用原生论、工具论和建构论这三种理论路径来解释族群冲突的产生。^② 而每种理论对于族群身份的产生也均有不同的解释。

原生主义理论认为族群身份是人们生来具有的属性。该理论假定族群纽带是人和人之间的固有关系，这种深厚的自然联系可以使人们与某些人建立联系，并

① Kenya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Ethnicity and Politicization in Kenya,” 2018, pp. 14 – 15, <https://www.khrc.or.ke/publications/183-ethnicity-and-politicization-in-kenya/file.html> [2020 – 03 – 15].

② 包刚升：《21 世纪的族群政治：议题、理论与制度》，《世界民族》2017 年第 5 期，第 1—13 页。

根据种族、宗教、语言或地理位置等因素与其他人产生自然的分裂。^① 该理论将族群视为客观存在的实体，族群身份对他们来说是单一且永恒的，并且具有明显的边界。因此，族群身份是固定且世代相传的。

工具主义理论则认为族群既不是人们生来具有的属性，也不是人的内在价值，而是为了寻求更多经济利益或者政治权力的基础，是将资源限制于少数人之间的一种手段。因此，在工具论的话语体系下，当某一族群身份提供相应的利益或者优势时，人们往往会选择与该族群身份相关联。

然而，原生论和工具论对族群身份的定义并不完整，因为这两种理论均无法解释族群身份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的事实。建构主义理论认为族群是政治和历史进程的产物，是一种具有可以识别的起源，以及具有扩张、缩小、融合和分裂历史的社会结构。族群身份是一种流动的社会类别，每个人有多个维度的族群身份，而某个维度族群身份的活跃程度取决于其所处的环境以及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政治进程。^② 因此，族群身份可以通过征服、殖民或移民等多种手段建构起来，不是像基因一样是自然的、固定的或与生俱来的。^③

基于以上理论的认知，本文从以下三大部分进行分析：第一部分是从建构论的视角来分析殖民时期族群身份的产生和强化；第二部分是从工具论和建构论的角度来分析独立初期，肯尼亚族群身份的再建构与政治化的开始；第三部分也是从工具论和建构论的视角出发，分析肯尼亚民主化之后族群身份政治化的变化和发展。

殖民时期：族群身份的产生和强化

（一）前殖民时期和殖民早期：族群身份的建构

肯尼亚的国土大致可以分为四个自然地理区域：沿海平原、干旱的高原地区、肯尼亚高地和维多利亚湖周边地区。肯尼亚是一个相对干旱的国家，近 3/4 的国土没有定期且足够的降水来支持非灌溉农业发展。只有肯尼亚高原周边和沿海平原地区，有少量降水充足且肥沃的土地可以维持人口密集的农业生产活动。

① Wsevolod W. Isiajw, "Definition and Dimensions of Ethnicity: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3, pp. 407 - 427.

② Chandra Kanchan, "Cumulative Findings in the Study of Ethnic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Section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Vol. 12, No. 1, 2001, pp. 7 - 11.

③ Wimmer Andreas,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Ethnic Boundaries: A Multilevel Process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13, No. 4, January 2008, pp. 970 - 1022.

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肯尼亚各部族^①的定居地和迁移方式灵活。在 19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一些地区接收外来移民，而另一些地区则由于部族战争和自然灾害等导致人口迅速减少。肯尼亚部族社会中，大多没有建立起类似于中央集权酋长国的社会政治组织。在不同部族争夺土地和牲畜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制度化的土地行政制度，大部分土地并不属于某一特定的部族，部族社会也处于不断凝聚、融合或者分裂的状态。抵抗外来袭击，扩展新的农业或放牧用地的共同需求，使得人们并非对某一部族有着稳定的忠诚。^②

因此，在前殖民时期，肯尼亚的部族划分反映了共同的生活地点、语言和文化等特征，部族划分不是固定或一成不变的。个人层面的部族身份也不是原生的，而是流动且相互融合的，基于部族的中央集权政治结构也基本上不存在。^③权威具有非常强烈的个人和地方色彩，往往由血统、年龄、财富等因素决定，并不是由共同的部族身份认同和忠诚所决定的。

肯尼亚国界的粗略划分可以追溯到英国和德国在东非划分势力范围之时。现在肯尼亚国土的大部分地区，随着 1895 年“东非保护国”的成立由英国政府开始管辖。为了进一步巩固殖民统治，英国政府于 1896 年至 1902 年之间修建了一条连接肯尼亚海港城市蒙巴萨到维多利亚湖地区的铁路，即肯尼亚—乌干达铁路，标志着大规模欧洲移民的开始。

殖民政府规定将土地清晰地划分为居住地和无人居住地，并将他们所划分的无人居住地转让给欧洲定居者。然而，很多被划分为无人居住地的土地，事实上是不同部族之间故意留出的缓冲地带。殖民政府对土地的划分，不仅没有考虑到传统农耕和游牧部族的自然属性，也忽略了这些土地作为缓冲地带的职能。这种土地出让方式导致欧洲人定居地的扩散，促使“本土保留地”的建立，也造成部族之间的隔离，并且明显阻碍了部族之间的合作。^④

“东非保护国”的管理权于 1905 年被移交至殖民办公室。1920 年“东非保护国”改名为“肯尼亚殖民地”。英国殖民政府在 20 世纪初开始实行省级行政管理模式，将肯尼亚国土划分为省与地区的管理结构。由于缺乏直接管理殖民地

① 本文将 tribe 这一术语翻译为部族，指的是前殖民时期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耕或游牧社会，由语言、文化、宗教和风俗习惯等相同或相近的若干氏族或部落所组成的一个群体。更为细节的讨论可参考张宏明《论黑非洲国家部族问题和部族主义的历史渊源——黑非洲国家政治发展中的部族主义因素之一》，《西亚非洲》1995 年第 5 期，第 44—51 页。

② Edward W. Soja, *The Geography of Modernization in Kenya*,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68, pp. 8–11.

③ Abdul Sheriff, *Social Formations in Pre-Colonial Kenya*, Historical Association of Kenya, 1985, pp. 1–32.

④ Edward W. Soja, pp. cit. pp. 16–19.

的人数和资金，英国殖民政府通过任命地方代表以及酋长的方式来管理肯尼亚人。这些被殖民政府所任命的酋长几乎没有任何传统地位，他们的主要职能是代替殖民政府征税，向种植园提供劳工，监管保留地，以及协助传教士进行文化传播等。^①英国殖民政府遵循“分而治之”的政策，规定了在划定的保留地可以使用该保留地的特定部族，并且禁止跨界居住和土地购买。英国殖民政府与地方政治精英之间的利益一致，他们都将更进一步的地区族群同质性作为加强治理的手段。为了促进行政管理，英国统治者着手划分人口并创建族群同质性的实体，行政区域边界也以地区族群同质性为目的而逐渐改变。

为了创建自给自足、封闭、静态和同质的语言和族群单位，原本流动的部族身份被冻结，新的族群身份被构建起来。例如，殖民政府通过将文化上不同的几个部族居住区故意合并成一个更大的地区，构建了梅鲁族（Meru）这一族群身份。^②这些措施加速了族群内部的同化和聚合，并且逐渐减少了肯尼亚人公认以及自认的族群数量。到1933年，地区边界划分使每个地区通常都有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族群。到1963年肯尼亚独立时，地区和族群的界限紧密重合。因此，同很多非洲国家一样，肯尼亚族群身份认同的形成与殖民统治息息相关。本土保留地边界的划分以及隔离，固化了不同部族之间原本流动的边界，建构了人们对族群身份的自我认知。^③

（二）殖民晚期：政治活动与族群身份的强化

早在肯尼亚—乌干达铁路修建的过程中，殖民者就掠夺了铁路沿线的大量土地。随着欧洲殖民者大规模的移民，殖民政府没收了肯尼亚为数不多最为肥沃的土地用于种植园经济。由于缺少肥沃的土地进行农业生产，再加上本土保留地人口拥挤，饥荒和沉重的税收迫使成千上万的肯尼亚人离开保留地，前往城市地区或者欧洲殖民者占领的种植园中寻找工作。在种植园工作的肯尼亚人被迫成为“棚户民”，以很低的薪水甚至在没有薪水的情况下工作。同样，在城市工作的肯尼亚人也持续遭受着压迫。

为了控制和识别劳动力，殖民政府于1915年通过了《本土人登记法令》，规定每位15岁以上的肯尼亚男子在保留地之外必须随身携带名为“基潘德”（Kipande）的登记证，每次进入或离开工作岗位时，雇主都必须在证书上签字。

① JD Overton, "Social Control and Social Engineering: African Reserves in Kenya 1895 – 1920,"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Vol. 8, No. 2, 1990, pp. 163 – 174.

② Bethwell A. Ogot, *History as Destiny and History as Knowledge: Being Reflections on the Problems of Historicity and Historiography*, Kisumu: Anyange Press, 2005, p. 280.

③ 周倩《当代肯尼亚国家发展进程》，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第88—89页。

因此基潘德上面包含了肯尼亚人在本土保留地之外所有的就业信息。此外，该制度还通过限制肯尼亚人离开工作岗位以及与雇主讨价还价的自由来帮助欧洲移民获得廉价劳动力。因此，该制度是殖民政府为了满足欧洲移民需求所做出的最令肯尼亚人厌恶的改革之一。^① 欧洲移民所占领的“白人高地”（white highlands），传统上是基库尤族（Kikuyu）的聚居地。1945 年，在白人高地工作的 20 多万棚户民中，一半以上是基库尤族人。^② 因此基库尤族是因殖民统治丧失土地最多的族群之一，由于深刻的利益冲突，他们一直是反抗殖民统治的中坚力量。

在 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殖民政府任命的酋长在肯尼亚中部地区组建了该国第一个政治团体——基库尤族联盟。该组织名义上声称将发动一场政治战争，反对基潘德体系、土地转让和强迫劳工政策，实际上是企图破坏肯尼亚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发展。因此，肯尼亚中部和其他地区的人们拒绝该组织的领导。^③ 随着 1921 年青年基库尤族联盟（Young Kikuyu Association）在内罗毕成立，肯尼亚经历了第一批真正的反帝国主义运动。该联盟动员了肯尼亚主要城镇一大批工人阶级的力量，组织了多次群众集会来反抗殖民统治，要求在该国建立民主制度并公平地分配国家财富。

在广大肯尼亚人的支持下，青年基库尤族联盟备受鼓舞，进而解散了地区性的政党，组成了一个能够团结和动员肯尼亚、乌干达和坦桑尼亚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来反对殖民者对东非统治的统一战线，东非人联盟（East African Association）应运而生。然而，随着三位基库尤族领导人入狱，该联盟在 1922 年被禁止。殖民政府随后采取了减免税收等政策来安抚肯尼亚人，在阻止全国范围内政治活动的同时允许各个族群成立自己的政治组织来表达利益诉求。因此，在随后的二十年中，以各族群为背景的政治组织急速增加，但他们的政治活动仅局限于狭义上的族群问题，族群身份作为利益共同体的认知也逐渐增强。^④

肯尼亚非洲联盟（Kenya African Union，简称 KAU）是肯尼亚人首次组建的全国范围的组织。该联盟成立于 1944 年，其目的是团结所有肯尼亚人进行一场非暴力的宪法革命。该联盟在初始阶段有着广泛的族群和阶级构成。1947 年，基库尤族的乔莫·肯雅塔开始担任该联盟主席。该联盟随后组织了一场由几支阶

① Bruce Berman and John Lonsdale *Unhappy Valley: Conflict in Kenya & Africa* ,Book 1: State & Class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13.

② 周倩：前引书，第 113 页。

③ Maina Wa Kinyatti *History of Resistance in Kenya 1884 -2002* ,Mau Mau Research Centre 2008 , pp. 36 -45.

④ Rok Ajulu, “Politicised Ethnicity ,Competitive Politics and Conflict in Kenya: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 *African Studies* ,Vol. 61 ,No. 2 2002 ,pp. 251 -268.

级力量组成的广泛的民族运动，包括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武装分子、受过教育的非洲精英和中产阶级。然而，1952 年爆发的茅茅起义（Mau Mau Uprising）使肯尼亚进入“紧急状态”，最终导致联盟领导人被捕和监禁。一年之后，该联盟被禁止，肯尼亚的政治活动又恢复到以族群为基础的组织状态。^①

茅茅起义后，殖民政府被迫放松了对政治活动的限制。1957 年英国殖民宪法允许肯尼亚人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殖民地立法委员会，但是这项权利仅仅局限于少数受教育的精英团体，大部分肯尼亚人被排除在外。此外，选举只允许在地区层面进行，这不仅埋下了地方族群主义的种子，还将一些少数族群的代表带到政治中心的舞台，例如卡伦金族的丹尼尔·阿拉普·莫伊（Daniel Arap Moi）。然而这些人既没有政治活动经验，也没有与早期政治组织的联系。^② 1959 年殖民政府消除了对全国性政党的限制。关于独立后国家的权力斗争主要发生在非洲民族主义的两股力量之间，其中一股力量是以乔莫·肯雅塔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反殖民统治的斗争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早期；另一股力量则是在茅茅起义后出现的以莫伊为代表的来自于少数族群的政治精英。

在独立前进行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肯尼亚人口由 40 多个族群组成，其中基库尤族、卢奥族（Luo）、卢希亚族（Luhya）、卡伦金族（Kalenjin）和坎巴族（Kamba）是人口最多的五大族群，占总人口的 60% 以上（见表 1）。自 1963 年独立以来，虽然肯尼亚人口总数增长了近五倍，但这五大族群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肯尼亚的 41 个地区中有 38 个地区 50% 以上的人口属于同一族群，直到现在仍然如此。只有首都内罗毕、蒙巴萨和跨恩佐亚三个地区不受单一族群所支配。^③ 因此，殖民时期各部族之间边界的划定和隔离，以及民族独立运动初期以族群为背景的政治组织形态，逐渐强化了肯尼亚人对族群身份的自我认同，为日后族群身份的政治化埋下了伏笔。^④

表 1 历年人口普查中五大族群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单位：百分比）

族群名称	1962	1969	1979	1989	1999	2009	2019
基库尤	19.0	20.1	20.9	20.8	18.5	17.7	17.1
卢希亚	12.6	13.3	13.8	14.4	14.2	14.2	14.3

① 罗伯特·马克森 《东非简史》，王涛、暴明莹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12—216 页。

② Clyde Sanger and John Nottingham, “The Kenya General Election of 1963,”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Vol. 2, No. 1, 1964, pp. 1–40.

③ Robin Burgess, et al., “The Value of Democracy: Evidence from Road Building in Keny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5, Vol. 105, No. 6, pp. 1817–1851.

④ 参见周倩：前引书，第 136—152 页。

卢奥	13.3	13.9	12.8	12.4	10.8	10.8	10.7
坎巴	10.8	10.9	11.3	11.4	10.3	10.4	9.8
卡伦金	10.5	10.9	10.8	11.5	12.1	13.3	13.4
汇总	66.2	69.1	69.6	70.4	65.9	66.4	65.3

资料来源: 1962—2009 年数据来源于 Kenya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Ethnicity and Politicization in Kenya,” 2018 <https://www.khrc.or.ke/publications/183-ethnicity-and-politicization-in-kenya/file.html> [2020-03-15]。2019 年数据来源于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199555/share-of-ethnic-groups-in-kenya/> [2020-03-15]。

独立早期：族群身份再建构与政治化的伊始

尽管在 1960 年召开的兰开斯特议院会议上，英国殖民政府开始允许肯尼亚成立全国性政党，但是肯尼亚缺乏全国性政治组织的坚实基础。基于地区和族群的组织形式已经根深蒂固，它注定成为政治组织的主要特征，也成为族群分裂及其政治化最有效的途径。同年 5 月，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Kenya African National Union, KANU，简称“肯盟”）成立，基库尤族的乔莫·肯雅塔被推举为肯盟的主席，卢奥族的奥金加·奥廷加（Oginga Odinga）担任副主席。肯盟成员主要来自基库尤族、卢奥族、坎巴族和卢希亚族。

此后不久，由于担心基库尤族和卢奥族等多数族群在政治上占据支配地位，尤其是在权利分配和土地问题上无法保护少数族群的利益，卡伦金族、卢希亚族等少数族群成立了肯尼亚非洲民主联盟（Kenya African Democratic Union, KADU，简称“肯民盟”）。肯民盟由卡伦金族的丹尼尔·阿拉普·莫伊（Daniel Arap Moi）领导，为了防范专制政府的产生，提出了马吉姆博主义（majimbo），其核心是建立一个地方分权的联邦制国家。^① 同许多非洲国家相同，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肯盟）则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以促进狭隘的族群身份认同转变为更广泛的国家认同，进而巩固和维护国家的独立。^② 这使得肯民盟成为族群分离主义的政党，这也体现了两党在宪法上的深刻差异。^③

除肯盟和肯民盟之外，还有一系列以地区和族群为背景的政党也相应成立，并参加了 1963 年肯尼亚独立后的第一次选举。在两个最大族群基库尤族和卢奥

① Rok Ajulu, “Politicised Ethnicity, Competitive Politics and Conflict in Kenya: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frican Studies* 2002, Vol. 61, No. 2, pp. 251–268.

② 张宏明 《部族主义因素对黑非洲国家政体模式取向的影响》，《西亚非洲》1998 年第 5 期，第 11—17 页。

③ 李鹏涛、胥帅 《当代肯尼亚族群政治中的马吉姆博主义》，《非洲研究》2017 年第 11 期，第 18—36 页。

族的支持下，肯盟主席乔莫·肯雅塔赢得选举，成为肯尼亚独立后第一任总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作为反对党肯民盟的所有议员都加入了执政党肯盟，导致反对党在议会代表权的暂时终止。然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几名肯盟成员叛逃到一个新的左倾党派肯尼亚人民联盟（Kenya People's Union, KPU，简称“民盟”）。该党派由卢奥族的奥金加·奥廷加（Oginga Odinga）领导，反对执政党肯盟日益增长的保守主义和乔莫·肯雅塔的亲西方倾向。然而，冷战的反共逻辑以及基苏木大屠杀使得肯尼亚人民联盟在 1969 年被禁止，卢奥族的议员们被拘留，整个卢奥族完全被政治边缘化。

在独立前的宪法会议上，不仅确定了肯尼亚是联邦制国家，还规定被欧洲人占领的土地必须由肯尼亚人购买才能获得。然而在乔莫·肯雅塔时代，土地作为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手段，其分配明显偏向了执政党的核心选区，即基库尤族的聚集区。^① 此外，乔莫·肯雅塔时代大部分的内阁成员，也皆由基库尤族所担任。政治以及经济优先权作为一种族群资源在肯雅塔时代被常规化。^② 不公平的资源分配，不仅加深了不同族群之间的不平等，也进一步强化了族群身份作为利益共同体的认知。

肯尼亚人民联盟被禁使得肯尼亚从多党制国家成为事实上的一党制国家。乔莫·肯雅塔于 1978 年意外去世，根据宪法规定，时任副总统的莫伊掌权。莫伊继续遵循肯雅塔的脚步，进一步巩固一党制国家。在 1982 年由基库尤族军官领导的一次未遂政变之后，莫伊以平衡族群关系为名，进行了“非基库尤化”（de-Kikuyu-ization）运动，将军事、警察和安全机构等部门的负责人替换为卡伦金族的忠实拥护者，并逐渐建立起包括卡伦金、卢希亚以及少数族群之间的联盟。莫伊有意联合几个人口较少的族群，创造了被称为卡伦金的族群。直到他成为总统后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卡伦金才作为一个统一的族群出现。毫无疑问，莫伊促进了人们对卡伦金族这一族群身份的认同感。^③

由此看出，在肯尼亚独立早期，政治精英不仅重新建构了卡伦金族这一族群，还成立了以族群和地区为背景的政党。这些政党的族群化，使得他们在政治、经济和公共资源的分配上都将族群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在获得资源时族群身份所带来的不平等加深了不同族群之间的裂痕，而这种裂痕主要存在于执

① Catherine Boone, "Land Conflict and Distributive Politics in Kenya,"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 55, No. 1 2012, pp. 75 - 103.

② Odhiambo E. S. Atieno. "Ethnic Cleansing and Civil Society in Kenya 1969 - 1992,"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frican Studies*, Vol. 22, No. 1 2004, pp. 29 - 42.

③ Njogu Kimani, Ngeta Kabiri and Wanjau Manjau, *Ethnic Diversity in Eastern Africa: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Nairobi: Twaweza Communications 2010, pp. 44 - 45.

政党所代表的族群以及其他族群之间。^①

民主化后：族群身份政治化与族群联盟投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非洲领导人因民主化问题受到来自国内外的双重压力。多个西方援助国和国际机构以政治、经济和行政改革作为恢复援助的条件，莫伊被迫召开执政党特别全国代表会议并将反对党合法化。肯尼亚于 1992 年举行了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第一次多党选举（见表 2）。^②

表 2 肯尼亚的政权更迭（1963 年至今）

总统	肯雅塔	肯雅塔	莫伊	莫伊	齐贝吉	肯雅塔
所在族群	基库尤族	基库尤族	卡伦金族	卡伦金族	基库尤族	基库尤族
政治体制	多党制	一党制	一党制	多党制	多党制	多党制
起始时间	1963—1969	1969—1978	1978—1992	1992—2002	2002—2013	2013 年至今

在独立初期，族群身份已经成为人们获得政治和经济资源的重要手段，政党往往代表着某些族群的利益，政治精英也为了其政治目的构建新的族群身份，并以此作为政治动员的基础。在多党竞争的冲击下，族群政治在政党层面有了新的体现。在之后的分析中，本文将着重从族群投票的角度来分析族群政治在肯尼亚民主化之后的具体表现、演变和发展。

（一）1992 年至 1997 年选举：族群投票初露端倪

1992 年，肯尼亚举行了自 1966 年以来第一次多党选举。大选前的人口普查显示，各大族群的人口比例和 20 世纪 60 年代基本相同（见表 1），没有任何一个族群在人口数量上占据主导地位。最大的族群仍然是基库尤族，主要生活在该国的中央省，然后依次为生活在肯尼亚西部的卢希亚族、维多利亚湖附近尼安萨省的卢奥族、裂谷省的卡伦金族、以及内罗毕东部和东南部的坎巴族。

一开始，反对党似乎可以轻松地取得选举胜利，因为由莫伊领导的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的政治优势仅限于裂谷省。莫伊政府为了赢得选举胜利修改了宪法，规定总统候选人在 8 个省中的 5 个省获得至少 25% 的选票方可赢得选举。竞选活动伊始，在肯尼亚境内就发生了各种以族群为基础的暴力冲突。这些暴力冲突主要发生在莫伊所代表的卡伦金族和非卡伦金族之间。然而，老牌政客们领导的反

① 金迷迷 《肯尼亚族群冲突与整合研究》，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 23—25 页。

② 曾爱平 《肯尼亚政党政治演变及特点》，《当代世界》2018 年第 4 期，第 58—61 页。

对党由于族群利益冲突分裂为两个主要的集团：前副总统姆瓦伊·齐贝吉领导的民主党以及奥金加·奥廷加（Oginga Odinga）和肯尼思·马蒂巴（Kenneth Matiba）领导的恢复民主论坛（Forum for the Restoration of Democracy, FORD）。选举前几个月，恢复民主论坛进一步分崩离析，分裂为马蒂巴领导的恢复民主论坛—正统（简称“FORD—Asili”）和奥廷加领导的恢复民主论坛—肯尼亚（FORD—Kenya）。因此，反对党的分裂使得莫伊在仅略高于 30% 支持率的情况下再次当选。

表 3 列举了 1992 年各省对各党派总统候选人的支持情况以及主要族群的人口比例。除了在“自己人”的裂谷省以外，莫伊还在沿海省和东北省获得了大多数的选票。民主党候选人齐贝吉仅在东部省表现出色。第三位候选人马蒂巴在基库尤族集中的中部省和内罗毕赢得了大部分的选票，而奥金加·奥廷加则在尼安萨省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总的来说，莫伊只能够在反对党所在族群占比较少的地区赢得支持。虽然 1992 年省级投票的数据显示，人们的投票行为并不是完全与其族群身份一致，但不同族群投票行为的明显分裂揭露出多党制民主在肯尼亚沿着族群界限运作的本质。

表 3 1992 年肯尼亚省级总统选举投票结果及 1989 年人口普查主要族群人口占比（单位：百分比）

省份	1989 年人口普查		肯尼亚民族联盟	肯尼亚民主党	恢复民主论坛—肯尼亚	恢复民主论坛—正统
	马蒂巴 (基库尤族)	主要族群	占比	莫伊 (卡伦金族)	齐贝吉 (基库尤族)	奥金加·奥廷加 (卢奥族)
内罗毕市	基库尤族	32.4	16.7	18.7	20.3	44.3
中央省	基库尤族	93.8	2.0	36.0	10.0	60.8
沿海省	米基肯达族	54.4	63.4	10.6	15.3	10.8
东部省	坎巴族	53.9	37.2	50.5	1.8	10.4
东北省	索马里族	36.0	78.0	4.6	7.2	10.2
尼安萨省	卢奥族	57.9	14.9	6.0	76.9	1.6
裂谷省	卡伦金族	46.4	65.9	8.4	6.2	19.5
西部省	卢希亚族	86.2	40.0	2.6	18.1	39.3
全国			34.9	20.1	18.2	26.9

资料来源：省级各族群的人口比例来源于 1989 年肯尼亚人口普查。1992 年总统选举数据来源于 Throup David and Hornsby Charles *Multi-party Politics in Kenya: The Kenyatta & Moi States & the Triumph of the System in the 1992 Election*,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April 15, 1998, p. 128。主要族群指的是在某一地区人口占比最大的族群。

在 1997 年选举中，虽然齐贝吉成为基库尤族唯一的候选人，但其影响力仅

局限于自己族群内部，各反对党最终因为分裂重蹈了五年前的覆辙。^① 很多国内的研究以地方民族主义来描述肯尼亚政党的特点，从表 2 的数据可以看出地方民族主义本质上是族群政治在地区层面的体现，与殖民时期以及独立后肯尼亚的地区划分仍然按照族群划界的政策紧密相关。^②

（二）2002 年至 2007 年的选举：族群联盟投票的开端

民主化之后的前两次选举，让人们认为肯尼亚选举仅仅是族群层面的人口普查，因为普通民众往往会投票支持同自己族群身份相同的总统候选人。这一观念在 2002 年大选时得到了削弱。自 1997 年大选后至 2002 年初，形势起初向着对执政党肯盟有利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 2002 年奥金加·奥廷加的儿子拉伊拉·奥廷加（Raila Amolo Odinga）所领导的国家发展党（National Development Party）并入肯盟之后，肯盟声势大增，如虎添翼。^③ 为了争取基库尤族的支持并确保退休后仍然可以影响肯尼亚政局，莫伊突然推出肯尼亚开国总统肯雅塔之子乌胡鲁·肯雅塔作为其接班人。肯盟内部经验丰富的竞选者们均担心从政不久的肯雅塔因缺乏足够的政治经验而难以担此重任，肯雅塔的提名加剧了肯盟党内斗争，其内部持不同政见的派别最终脱离该党，成立了自由民主党。^④

在执政党慢慢瓦解的同时，齐贝吉在 2002 年的头几个月与肯尼亚国家党以及其他几个较小政党合作建立了一个反对党联盟，之后更名为肯尼亚国家联盟党。2002 年 10 月，自由民主党与肯尼亚国家联盟党签署了一份协议备忘录，成立了一个新的“超级联盟”，即全国彩虹联盟，同时确定齐贝吉是新联盟唯一的总统候选人。该协议包含了在全国彩虹联盟获胜的情况下，联盟各组成部分之间权力共享的具体内容。

全国彩虹联盟不仅包括卢奥族的拉伊拉·奥廷加，也包括坎巴族的卡隆佐·穆西约卡（Kalonzo Musyoka）。虽然有五位总统候选人参与竞选，但只有两位基库尤族候选人最有希望赢得大选。^⑤ 从表 3 的投票结果可以看出，在莫伊的支持下，乌胡鲁·肯雅塔在裂谷省获得卡伦金族的支持，而齐贝吉则通过广泛的族群联盟以压倒性优势赢得选举胜利。面对族群身份相同的总统候选人，族群投票的

① 张永蓬 《地方民族主义与肯尼亚多党大选——以 1992 年和 1997 年肯尼亚多党大选为例》，《世界民族》2002 年第 6 期，第 28 页。

② 张永蓬、曹雪梅 《肯尼亚政党的地方民族主义背景》，《西亚非洲》2002 年第 2 期，第 25—28 页。

③ 高晋元 《肯尼亚多党制和三次大选初析》，《西亚非洲》，2004 年第 2 期，第 33—34 页。

④ David M. Anderson, “Briefing: Kenya’s Elections 2002 – the Dawning of a New Era?” *African Affairs*, Vol. 102, No. 407, 2003, pp. 331 – 342.

⑤ 参见周倩：前引书，第 228—231 页。

历史也开始被重新定义。对比 2002 年和 1992 年的选举结果可以发现,不同族群的普通民众所支持的实际上是自己所在族群的政治领袖或政党。因此,裂谷省卡伦金族对乌胡鲁·肯雅塔的支持以及其他族群聚集地区对齐贝吉的支持,并不意味着族群投票的弱化,而是反映了族群政治从支持与自己族群身份相同的政治家向支持更广泛族群联盟的转变。

表 4 2002 年肯尼亚总统大选结果及 1989 年人口普查主要族群人口占比 (单位: 百分比)

省份	1989 年人口普查	肯尼亚民族联盟	全国彩虹联盟	
	主要族群	所占比例	乌胡鲁·肯雅塔 (基库尤族)	齐贝吉 (基库尤族)
内罗毕市	基库尤族	32.4	20.7	76.8
中央省	基库尤族	93.8	27.4	71.8
滨海市	米基肯达族	54.4	28.3	65.9
东部省	坎巴族	53.9	23.6	75.4
东北省	索马里族	36.0	65.6	34.0
尼安萨省	卢奥族	57.9	6.5	60.2
裂谷省	卡伦金族	46.4	53.6	42.1
西部省	卢希亚族	86.2	19.3	78.5
全国			30.6	62.3

资料来源: 省级各族群的人口比例来源于 1989 年肯尼亚人口普查。2002 年总统选举数据来源于 Electoral Geography 2.0 <https://www.electoralgeography.com/new/en/countries/k/kenya/kenya-presidential-election-2002.html> [2020-03-15]。

齐贝吉当选后,他成功兑现了对经济改革的承诺,但未能实现其对政治改革的承诺,比如颁布新的宪法将中央政府权力下放、设立总理职位以及削弱总统权力的规定等。这直接导致拉伊拉·奥廷加、穆西约卡等人从全国彩虹联盟的叛离,并成立了橙色民主运动 (Orange Democratic Movement, 简称 ODM)。

在 2007 年大选之前,橙色民主运动的出现使得肯尼亚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齐贝吉通过联合莫伊和乌胡鲁·肯雅塔领导的肯民盟重组了新的联盟,成立了全国团结党。与此同时,橙色民主运动建立了一个被称为“五角大楼”的领导人联盟,包括来自尼安萨省、西部省、裂谷省、东部省和沿海省的政治家。齐贝吉和拉伊拉·奥廷加的联盟都积极寻求基库尤族和卢奥族以外的选票,以吸引肯尼亚的许多摇摆族群。由于来自同一族群的知名领导人均加入了两党 (即全国团结党和橙色民主运动),很难仅根据族群身份预测选票结果。

在竞选活动中,双方都指责对方利用族群身份表达政治诉求。虽然民调显示拉伊拉·奥廷加一直领先,但最终大选结果却是齐贝吉获胜。国际和国内观察人

士几乎一致认为计票过程存在缺陷，由此引发了选举后广泛的暴力冲突和示威游行。在国内外的压力之下，对立双方经过两个月的政治危机，最终形成了权力分配的联合政府，齐贝吉继续担任总统，拉伊拉·奥廷加担任总理。^① 在 2007 年选举后的暴力事件中，有超过 1000 人丧生，近 70 万人流离失所，国际和国内均把注意力转向如何防止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的问题上来。从这一政治反省过程中得出的普遍接受的一种解释为肯尼亚的政治暴力植根于“赢家通吃”的政治制度，因此政治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②

（三）2013 年之后的选举：新宪法下的族群联盟投票

2010 年颁布的新宪法打破了国家权力的集中化，通过权力下放和建立新的选举规则改变了肯尼亚的政治权力结构，在很多方面回归到独立初期的马吉姆博主义。^③ 在国家层面，新宪法引入了一个两院制立法机构，设有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在地方层面，新宪法建立了一个由 47 个县政府组成的权力下放制度，每个县政府都有一名当选的县长、县议会和县执行委员会。为了有效地促进政治领导人结成更广泛的多族群联盟，开展更具包容性的竞选活动，新宪法规定获胜的总统候选人必须在至少 24 个县获得 25% 以上的选票。此外，由于总统选举实行两轮制，为了避免决选（即由于第一轮选举中因为没有候选人取得半数以上选票而举行的第二轮选举），总统候选人必须在第一轮便赢得 50% 以上的选票。

2013 年选举是肯尼亚宪法修订以来第一次选举，也是 2007 年暴力冲突发生以来的首次选举。更为复杂的是，乌胡鲁·肯雅塔和他的竞选搭档卡伦金族的威廉·鲁托（William Ruto）都因 2007 年大选后涉嫌所犯下的罪行而面临国际刑事法院的指控，这大大增加了他们输掉选举的风险。观察人士担心，如果乌胡鲁·肯雅塔和鲁托失利，基库尤族和卡伦金族可能会在动荡的裂谷地区煽动暴力。2007 年的经历对拉伊拉·奥廷加来说同样记忆鲜活，他在一场选举程序严重缺陷以及被广泛视为欺诈的计票活动所玷污的竞争中，输给了齐贝吉。^④

① Clark C. Gibson and James D. Long, "The Presidential and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in Kenya, December 2007," *Electoral Studies*, Vol. 28, No. 3, 2009, pp. 497–502.

② Nic Cheeseman et al., "Kenya's 2017 Elections: Winner-takes-all Politics as Usual?" *Journal of Eastern African Studies*, Vol. 13, No. 2, 2019, pp. 215–34.

③ 李鹏涛、胥帅 《当代肯尼亚族群政治中的马吉姆博主义》，《非洲研究》2017 年第 11 期，第 18—36 页。

④ James D. Long et al., "Kenya's 2013 Elections: Choosing Peace over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4, No. 3, 2013, pp. 140–55.

2013 年总统选举仍然是两个主要竞争对手之间的较量：肯雅塔领导的朱比利联盟（Jubilee Alliance，简称 JA）和拉伊拉·奥廷加领导的改革与民主联盟。后者联合了奥廷加自 2007 年选举以来领导的橙色民主运动和坎巴族的卡隆佐·穆西约卡（Kalonzo Musyoka）所领导的政党。^① 2013 年选举结果表明，肯尼亚人仍然按照族群身份的划分进行投票。同 2002 年选举结果相似的是，不同族群的普通民众支持的是与自己族群身份相同的政治领袖所在的族群联盟。例如，在基库尤族和卡伦金族聚居的中央省和裂谷省，大部分选民都支持肯雅塔—鲁托所建立的基库尤—卡伦金联盟；而在大部分由卢奥族和坎巴族聚集的尼安萨省和东部省，人们主要将选票投给了奥廷加所建立的卢奥—坎巴联盟。^②

自实行多党政治以来，基库尤族和卡伦金族有着长期暴力冲突的历史，裂谷省也是 2007 年选举后暴力冲突事件的中心。回顾 2013 年之前两个族群的投票模式也可以发现，基库尤族和卡伦金族一直处于政治对立面。肯雅塔和鲁托在 2013 年握手言和不仅表明了族群政治的流动性和复杂性，也揭示了政治精英和族群关系在应对新的政治制度时所做出的反应。

最终，乌胡鲁·肯雅塔以微弱的优势取得选举胜利。拉伊拉·奥廷加起初拒绝让步并在记者招待会上质疑选举结果，他与民间社会团体一起，请求肯尼亚最高法院判决选举无效并重新进行选举。最后，尽管法院承认了这一过程中存在实质性的缺陷，但它支持选举结果。拉伊拉·奥廷加接受了这一裁决，并告诫他的支持者们不要抗议，大规模暴力事件得以避免。

肯尼亚 2017 年大选是在 2010 年新宪法颁布后举行的第二次大选。现任总统乌胡鲁·肯雅塔和他的竞选搭档鲁托领导的朱比利党（Jubilee Party）是 2013 年选举时的朱比利联盟发展而来的。另一位候选人是领导着全国超级联盟（National Super Alliance）的拉伊拉·奥廷加。该联盟成立于 2017 年 1 月，包括改革与民主联盟以及由卢希亚族穆萨利亚·穆达瓦迪（Musalia Mudavadi）、卢希亚族摩西·韦坦古拉（Moses Wetang'ula）和卡伦金族伊萨克·鲁托（Isaac Ruto）领导的政党。

经过紧张的计票过程，乌胡鲁·肯雅塔以 54% 的得票率当选。拉伊拉·奥廷加和他的支持者们指责肯雅塔在竞选期间和竞选结束后以多种方式操纵民调。2017 年第一次总统大选结果之后，拉伊拉·奥廷加在最高法庭上挑战肯雅

① Horowitz Jeremy, "Ethnicity and the Swing Vote in Africa's Emerging Democracies: Evidence from Kenya,"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9 No. 3 2019 pp. 901 - 21.

② 2013 年肯尼亚大选结果详见 Electoral Geography 2.0 <https://www.electoralgeography.com/new/en/countries/k/kenya/kenya-presidential-election-2013.html> [2020 - 03 - 15]。

塔的胜利。2017 年 9 月 1 日，最高法院法官裁定总统选举非法无效，并下令进行重新投票。为了防止最高法院再次取消选举结果，肯雅塔利用他所领导的朱比利党在议会的多数席位，在第二次总统选举前推动了选举法的修改来捍卫自己的胜选地位。^① 同年 10 月 26 日第二次总统选举如期举行。在最终的投票中，肯雅塔以 98.3% 的选票当选，而官方数据显示投票率仅为 39%。投票的地域分布，以及尼安撒省四个县的投票站由于抗议活动而无法开放的事实，也揭示出国家仍然处于分裂状态。^② 然而，庆幸的是 2007 年族群冲突的历史并没有重演。

结 语

回溯肯尼亚族群身份的产生和强化以及独立以来族群身份政治化的历史路径，我们可以发现，族群身份的政治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具体表现形式、变化趋势皆有不同。具体来说，族群身份的建构和政治化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其一，殖民政府“分而治之”的政策，固化了不同部族之间原本流动的边界，建构了肯尼亚人对族群身份的自我认知。殖民时期各部族之间边界的划定和隔离，以及民族独立运动初期以族群为基础的政治组织形态，逐渐强化了族群身份作为利益共同体的认知。其二，独立早期，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基于族群身份不平等的资源分配，加深了不同族群之间的裂痕，标志着族群身份政治化的开始。其三，民主化后，族群身份的政治化不仅体现在政党的联盟建设层面，即使在普通民众层面，族群身份也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投票行为。因此，族群身份的建构与政治化不仅仅是殖民政府建立行政制度的结果，也是肯尼亚人政治环境变化的反应。

上述分析表明，族群身份政治化在肯尼亚独立早期主要体现在政党层面，而在民主化之后，族群身份政治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在普通民众层面也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2007 年肯尼亚大选危机之后，政治精英们逐渐意识到族群身份政治化所造成的危害，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和制度上的措施来削弱族群政治并解决其历史遗留问题。2010 年宪法改革通过权力下放、建立新的选举规则和设立国家最高法院等方式重塑了肯尼亚的政治权力结构。在政党层面，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以族群为基础，但是自 2002 年大选以来，政治精英们在选举中结成了更广

① 曾爱平 《肯尼亚政党政治演变及特点》，《当代世界》2018 年第 4 期，第 58—61 页。
② Nil Cheeseman, et al., “Kenya’s 2017 Elections: Winner – takes – all Politics as Usual?” *Journal of Eastern African Studies*, Vol. 13, No. 2, 2019, pp. 215 – 234.

泛的多族群联盟，族群政治在政党层面的表现进一步弱化。然而，从 2010 年宪法改革后普通民众层面的投票行为来看，族群身份仍然是影响肯尼亚普通民众投票行为最重要因素。在政治精英们建立的多族群联盟背景下，族群投票的表现形式从支持与自己族群身份相同候选者的模式转变为支持与自己相同族群身份的政治领袖所在联盟的模式。

族群政治化问题是世界上多族群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之一。族群身份的去政治化不可避免地要借助于政治制度、公共政策的改革等一系列政治手段来加以解决。^① 在肯尼亚这种几大族群并立的多党制国家，政党须得到几大族群的支持才可以在大选中获胜。从宪法改革后的两次选举可以出，每一个政党联盟都集结了各大族群的政治领袖，大选的角逐也逐渐集中在最有影响力的两大政党联盟中。在未来的选举中，很有可能难以仅根据族群身份预测选票结果。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新宪法颁布并没有彻底改变族群身份政治化在肯尼亚政治中的显著影响。如何建构一个多族群一体化的国家，仍然是肯尼亚在未来国家建设和政治改革进程中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责任编辑：章 波）

① 谢立中 《“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 争论之我见》，《高校理论战线》2014 年第 2 期，第 81—94 页。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began in Cote d'Ivoire. Historical , economic and social elements explain the long – term politico – military crisis. The unsustainable plantation economy leads to inequalities in social relations. Economic growth and authoritarian rule under Houphouët – Boigny temporarily curbed the outbreak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post – Houphouët – Boigny era , social conflicts intensified and divided the society of Cote d'Ivoire. Political leaders , state institutions , social organizations and other actors engage in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Due to political position and personal interests , the different levels of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face many obstacles and difficulties. The policy of promoting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through economic development under Alassane Ouattara has been difficult to bridge the social chasm caused by years of conflict. Only by breaking through the “relationship” level of reconciliation , implementing structural reforms and building a unified identity can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be truly achieved.

Keywords: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 plantation economy , ethnic conflict , Dialogu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Author: Meng Jin ,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of Institute of West –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ASS) , and the China – Africa Institute (Beijing 100101) .

Building and Politicization of Ethnic Identity in Kenya

Li Jia

Abstract: The ethnic group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ny African countries , and Kenya is one of the countries where ethnic identities are most salient. Similar to many African countries , the emergence of ethnic identity in Kenya is closely related to colonial rule. However , the construction of ethnic identity is not only caused by colonial history but also the result of Kenyan responses to the changing political environment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independence , the manipulation and use of ethnic identity by political elites resulted in the strengthening of exclusive ethnic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ization of ethnic identity. After democratization , the

politicization of ethnic identity wa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alliance – building of political parties , but also in general people. Ethnic identity remain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voting decisions of Kenyan people. The 2010 constitutional reforms reshaped Kenya’ s political power structure and promoted political parties to form a broader multi – ethnic alliance.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predict the results based on ethnic identity alone in future elections. However , it is undeniable that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new constitution has not completely changed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the politicization of ethnic identity in Kenyan politics. How to build a multi – ethnic integrated country is still an important challenge that Kenya will face in the future process of nation – building and political reform.

Keywords: Kenya , ethnic identity , ethnic politics , constructivism , party politics

Author: Li Jia ,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of Institute of Institute of Economics ,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and Political Interaction in Tanzania in the 20th Century

Liu Yu

Abstract: The Bible was introduced into Tanzania as a Christian classic through western colonial activities. Christianity has exerte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people’ s lives , culture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Tanzania. The Bible is inextricably bound to colonialism. Both colonists and anti – colonialists would reinterpret and explain the biblical chapters that fit their own needs. The colonists would use the Bible to maintain their colonial rule , while the anti – colonists would use “the master’ s tool to dismantle the master’ s house” , namely using the Bible to overthrow colonial rule and obtain national dignity and independence. The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in Tanzania has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in the 20th century: Soma (reading) , Roho (spirit) and Ujamaa. Through the review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history in Tanzania , we can clearly se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in different stages in Tanzania and its political interaction meet the practical and psychological needs of people from different tribes and plays a significant inspiring and uniting role , which to certain extent